

試論二次大戰時期日本的恥感文化及對台灣處境之應用—以潘乃德及梅監霧作品為例 ---- 陳志忠

後現代學者在分析文化形成時，用「雜糅」的觀念來表達，認為文化的形成是一種時間演進的過程，而非突然的出現。後現代學者對文化看法，認為現在的文化是一種經過長時期演變和融合而來，此發展理論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文化是可以被宣稱未受到其他接觸過文化的影響。因此就歷史角度而言，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可以被不相關的獨立出來的，對過去文化的了解有助於解釋現在文化形成。

探討台灣社會文化與基督宗教信仰中心議題，必然觸及「罪感」(guilt)及「恥感」(shame)的文化基調。就地緣、氣候、傳統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上而言，台灣和日本在東方文化中相似性極高，基督教均同屬外來宗教。同時日本曾於西元 1895 到 1945 統治台灣五十年之久，並持續影響中。1920 年代以後學者以「恥感」(shame)和「罪感」(guilt)為人類文化及精神分析學研究的主題，開始對東方文化特質有更多的探討，傳統上對文化分析認為日本是一個不同於西方特質的文化。潘乃德(Ruth Benedict)在其著作《菊花與劍》(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)對日本文化的觀察，為近代學者對日本恥感文化研究的先驅，而梅監霧在《異教徒之心》(The Heathen Heart)及《國王的客人》(The King's Guest)及其相關著作所表達對台灣漢人文化的觀察則是近代第一個，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以西方基督教的角度，對台灣文化特質從事實際觀察分析者。

二位作者在論述中均有富豐的主題和內容，而本文以二次大戰後潘乃德對日本文化觀察的論述，來分析日本文化特質，並嚐試應用在梅監霧對台灣漢人文化觀察結論比較分析，針對當時台灣漢人是否具有恥感文化特質作初步探討，並將不同神學學者對「恥感」(shame)和「罪感」(guilt)看法來回應二位作者的論述，或許可以提供給異於西方不同文化，作宣教上的參考和對照。